·文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4.06.004

女劳模形象生成再现与多重政治文化意蕴

——论“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

刘传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与“十七年”文学时期其他女性形象相比,女劳模是新中国文学最为耀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之一,兼具性别、阶级、政治等多重政治文化意蕴,为人们提供值得借鉴与需要反思的样本。在“十七年”时期女劳模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出现,或者说妇女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生产而获得国家表彰嘉奖,是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作家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动的态势,改变了社会以及妇女自身对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妇女审美的认知。尽管“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建构存在着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十七年”时期对劳动妇女的大力表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所采取的倾斜性政策,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和劳模表彰制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十七年;女劳模形象;妇女解放;女作家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6-0038-08

模范是指人们广泛学习、效仿的楷模与榜样;而模范形象是社会对这种楷模、榜样进行建构的话语产物。劳模即劳动模范,是指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堪称榜样、楷模的典型性人物。树立榜样、建立典范的表彰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树立劳动模范、对生产劳动典范进行表彰激励,却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基础上,学习、借鉴苏联模范表彰方法之后所开创的新制度。新中国建立了系统的劳模表彰制度,大批妇女获得表彰,成为劳动模范;“文学艺术、新闻媒体等都在用语言、图像等媒介话语来塑造女劳模形象,女劳模成为新中国最为耀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①。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个女推土机手胡友梅,护厂英雄赵桂兰,纺织能手郝建秀、吴文英、黄宝妹,铁姑娘邢燕子、侯隽等著名女劳模,成为文学艺术竞相表现的对象。在“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建构队伍中,女作家是重要力量。白朗的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1951),蓝光的独幕剧《姐妹俩》(1954),申蔚的小说《春播时节》(1961)、黄宗英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1963)、《小丫扛大旗》(1964)等塑造了在重工业兵工厂、轻工业纺织厂以及农村人民公社里涌现出的女劳模形象,展现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工业生产刚刚恢复,到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开展,以及60年代前后的女劳模形象。从兵工厂护厂英雄邵玉梅(《为了幸福的明天》)、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姐妹俩》),到农村劳动模范方秋梅(《春播时节》),再到铁姑娘侯隽(《特别姑娘》)、张秀敏(《小丫扛大旗》),这些女劳模形象的变迁,投射了“十七年”时期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曲折性,呈现了妇女解放与国家表彰之间的复杂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劳模文学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7)。

[作者简介]刘传霞,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邮箱:sh_liucx@ujn.edu.cn。

①刘传霞:《论“十七年”女作家创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一、劳模表彰制度与女劳模形象生成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沿用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模表彰制度，不断树立典型榜样，举行国家层面、全国范围的高层次、大规模的表彰活动。1950—1960年，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性劳模和先进生产者代表表彰大会，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学习劳模、争做劳模、搞好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热潮。在这些劳模表彰大会上，妇女代表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一期间还召开了专门表彰妇女的全国性会议：1958年12月召开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6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50周年之际，全国妇联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表彰活动。劳模表彰制度为女劳模形象的产生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十七年”时期女劳模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出现，或者说妇女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而获得国家表彰嘉奖，是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女劳模形象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将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主张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不论是早期共产党人、妇女运动领袖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还是后来的毛泽东、蔡畅、邓颖超等，都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把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充分肯定妇女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力量和作用；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中国妇女运动，强调劳动妇女解放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任务，呼吁把妇女解放的重点放在劳动妇女身上。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提出妇女为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不应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而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毛泽东也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必须与妇女解放相结合，否则革命不会成功。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①]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②]毛泽东还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拓展这一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特别是对劳动妇女解放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和中国妇女命运。正是有中国共产党对劳动妇女的重视，劳动妇女才能走进国家表彰视域之中，成为人民学习效仿的典范，女劳模形象才能深入人心，被整个社会接纳认同。

其次，女劳模形象的出现，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妇女劳动资源的迫切需求有关。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就将工作中心确定在发动妇女生产、推动妇女经济独立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随后开展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调动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动员妇女广泛而深入地加入生产劳动之中。大跃进时期，由于劳动力短缺，为了尽快完成国家建设计划，对妇女参加公共领域生产劳动的动员、表彰和奖励都达到了历史高峰。1955年，毛泽东针对动员妇女广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多次做出指示：“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④]；“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⑤]；“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9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7页。

④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7页。

⑤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675页。

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①]。国家对妇女人力资源的迫切需求和重视,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走进各行各业之中,并在生产建设中表现出卓越的聪明才智,进而获得极高的社会荣誉,被国家表彰为劳动模范;而对妇女劳动模范的宣传与表彰,又会鼓励、带动、吸引更多的妇女加入社会生产建设之中,二者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各行业都展开了"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在这些劳动竞赛中,大批女劳模涌现出来。当然,大跃进时期对妇女人力资源的动员与征用,存在着超出当时社会物质条件和妇女身体条件的问题,对女劳模形象的宣传、形塑也存在拔高、净化、提纯等问题。

二、女劳模形象的再现与建构

女劳模是国家树立与表彰的妇女典型,相对其他妇女群体,女劳模形象更具政治符号的特征,她们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优秀妇女的期待和要求。这一时期女作家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一方面与男作家一样随着时代政治话语更迭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女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文学叙事中不自觉地呈现出与男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女劳模书写的刻板化印象。

陈云在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人民的英雄是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和广大群众一起,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然后才能领导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真正发挥毛主席所说的桥梁,骨干与带头作用。"[②]国家层面对劳模的规范与阐释,构成了"十七年"时期劳模形象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对劳模形象的塑造,基本上也是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楷模的要求而进行再现与想象的。

女作家笔下的女劳模形象,主要由工厂女工和农村妇女构成。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优秀代表,人民群众学习和效仿的楷模,护厂英雄邵玉梅,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农村公社劳模方秋梅,铁姑娘侯隽、张秀敏,都无限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具有忠于职守,无私忘我,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吃苦耐劳,钻研业务,助人为乐等品格;她们影响了周围大批妇女走向先进;都有挑战男强女弱传统性别认知的自觉,敢于与男子比高低。

《为了幸福的明天》《姐妹俩》书写的是社会主义工业战线上的女劳模。《为了幸福的明天》记录的是护厂英雄邵玉梅的感人事迹,其原型来自大连兵工厂女工、全国首届劳动模范赵桂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时期,邵玉梅要过饭、做过劳工,整个童年、少年时期都处于凄楚孤苦之中。东北地区解放以后,因失业而生活无着落的邵玉梅,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兵工厂。邵玉梅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在厂领导、工友的帮助与爱护之下,她体会到家的温暖和主人翁的自豪。她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很快成长起来,由一个蒙昧无知的女工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优秀共产党员、懂业务的技术人员。邵玉梅像爱护家人一样爱护工厂,曾经三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工厂,最后一次身受重伤而致残。但是,她不怨不悔,依然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以美好、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生活。邵玉梅坚韧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乐观无私的态度,感染、教育、鼓舞了工厂的同事、医院里的病友。小说以邵玉梅和她的哥哥分别以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的身份参加1950年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相聚在北京而结束。

《姐妹俩》书写的是1953年底发生在上海纺织女工杨玉兰与杨玉凤姐妹之间的家庭琐事,通过姐妹俩对待工作和爱情的不同态度,展现了姐姐杨玉兰忘我工作、虚心学习、乐于助人、不断进取的精神以及果断刚强、沉静稳重的性格。杨玉兰是一个有十多年工龄的工人,有过与夏衍《包身工》里"芦柴棒"相似的凄惨遭遇,在工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工厂里,她才体会到工作的自豪感和成就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66页。

②《陈云副总理致开幕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26日第1版。

感，不再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废寝忘食地钻研业务，认真学习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的先进纺织技术，最终，她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她所领导的生产小组成为厂模范小组。妹妹杨玉凤聪明伶俐、美丽活泼，尽管也是一个技术能手，但是，由于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参加工作，没有姐姐的苦难经历，所以，她只把工作当作是“按劳取酬”的手段，追求快乐、轻松的生活。《姐妹俩》中妹妹在反驳姐姐时提到苏联妇女也喜欢唱歌、喜欢跳交谊舞，有着丰富的娱乐生活，这从侧面透露出当时上海女工，包括女劳模，她们的人生也有多面，只不过这些生活内容在女劳模形象塑造过程中被过滤掉了[①]。

《春播时节》《特别姑娘》和《小丫扛大旗》书写的都是扎根农村、为新中国建设贡献青春的女劳模。《春播时节》里的方秋梅，原本有机会到城里当工人，但是，她响应团中央发出的青年人扎根农村的号召，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返回农村，起早贪黑地带领青年改造十年九涝的家乡，她抓住春播时节，大搞丰产试验田，开展农业技术革新，引进机耕，提高生产效率。方秋梅大方热情，诚恳可亲，对农业、农村、农民满腔热情，全身心投入农村建设，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如果说《春播时节》对县劳动模范方秋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书写还比较朴实平和，那么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和《小丫扛大旗》对全国劳动模范侯隽、省劳动模范张秀敏的书写则铺张高昂。侯隽、张秀敏以及她们所带领铁姑娘队，都是当时国家树立的青年典范。

《特别姑娘》描写北京知青侯隽响应新中国对年轻人的号召——“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年轻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去”，她中学毕业后放弃在北京就业升学的机会，带着诗意化的想象，主动与好朋友结伴来到河北农村窦桥插队劳动。朋友的“背弃”、农活的劳累、生活的艰苦，一次又一次捶打着她，她有许多次可以离开农村的机会，但是，她拒绝、放弃了，坚定地留在窦桥，慢慢适应了农村生活，并且在农村开办夜校，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当地农民，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怜爱，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和佩服。侯隽既有温和稳重、包容大度、不急不躁的性格，又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小丫扛大旗》书写了以张秀敏为代表的一群农村女青年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改变家乡贫穷面貌的故事。张秀敏是一个活泼开朗、热情大方、吃苦耐劳、有着钢铁般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姑娘。20世纪50年代末，张秀敏响应党“学习艰苦奋斗精神，发奋图强，穷队赶富队”的号召，在青壮男子外出兴修水利、村里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时候，联合村里几个女青年和年轻媳妇成立“挖穷根突击队”，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在生产环境和条件极端艰苦与落后的情况下，用汗水、血水，在一年时间内把一个被人耻笑的“讨饭村”建设成了能够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富队，创造了生产奇迹。“挖穷根突击队”被光荣命名为“铁姑娘”，张秀敏被誉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冲锋的红旗手”。文章的结尾，张秀敏怀着“为了天下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为了世界革命而奋斗”[②]的远大目标，迎接侯隽代表窦桥全体青年向铁姑娘队发出的科学实验种田的挑战，以更大更高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之中。

女劳模形象是社会镜像的折射，她们的变迁投射着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变化。从50年代护厂英雄邵玉梅、纺织模范杨玉兰，到60年代人民公社劳模方秋梅、铁姑娘侯隽、张秀敏，这些女劳模形象的性格各有不同，但是，她们的基本品质和基本形象都是一致的。不过，仔细阅读文本，还是能发现这些作品在女劳模塑造上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其一是对女劳模的政治立场和阶级觉悟要求越来越高。在政治上，她们都忠诚于党和人民，能

①来自上海纺织行业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就是一个穿着时尚、爱好文艺、容颜美丽、身材窈窕的时尚女性，参演过纪录片《黄宝妹》，成为明星劳模。“尽管她最初以劳模身份走进人们的视野，却以美丽时髦的形象大放异彩。她外表光鲜，活跃于艺术舞台，得到国家媒体的大力宣传，在新上海引领着一种合法的时尚。”参见刘亚娟：《国家与都市之间：上海劳模形象建构与流变的个案研究（1949—1963）》，《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够做到为国家集体利益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在作品中她们都被称作是“党的女儿”。不过,从1950年到1964年,她们的政治觉悟、理想胸怀呈现了逐步走高走远的态势。邵玉梅、杨玉兰都是基于个人在解放前凄楚悲惨的人生经历,对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信赖与认同,她们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全心全意地投入生产劳动之中。方秋梅、侯隽、张秀敏则是接受现代革命教育,“树立了全心全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①,志存高远,胸怀全世界。在《特别姑娘》的结尾,作者是这样阐释侯隽的“特别”:“我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在年轻一代的血液里,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朵胜利之花。”②《小丫扛大旗》的结尾是:“在这座小村,这间小屋,这个小窗前,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测天量地,她看到了整个的世界。胜利属于永远革命前进的青年。”③

其二,女劳模的生活和情感越来越单纯。《为了幸福的明天》《姐妹俩》都书写了女劳模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为了幸福的明天》描写邵玉梅偷偷爱上了厂党委书记、伤残军人黎强;刻画了邵玉梅在得知自己受伤致残后伤心欲绝,甚至厌世求死的心情,整部作品以很长的篇幅叙述邵玉梅的伤情以及她如何抵抗病痛的过程,反而对她三次舍身护厂之壮举没有过多渲染,甚至指出她所遭遇的险情,有的还是自身原因导致的。《姐妹俩》则把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设计在家庭之中,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里来展现杨玉兰的品性,写出了她对爱情的向往。到了《春播时节》里的方秋梅,就已经开始把集体生产置于个人情感之上,方秋梅把自己对同村先进青年刘金顺的情感隐藏起来、压抑下去。《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则完全没有涉及铁姑娘的情感生活。

其三,文本中的政治话语意味越来越浓重。《为了幸福的明天》只是在厂党委的慰问信中,从党性立场等层面对邵玉梅的英勇行为和高尚品质加以总结,到了《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文中充满了大段的革命抒情和议论,作者不时脱离具体事件,站出来对侯隽、张秀敏的思想和行为做政治上的阐发、道德上的评析。

从护厂英雄邵玉梅、纺织模范杨玉兰,到农村公社劳动模范方秋梅、铁姑娘侯隽、张秀敏,“十七年”时期发生在女劳模形象以及塑造方法上的这些变化,与这些年国家意识形态对劳模形象的规训有关、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对妇女的需求有关。它不仅发生在女劳模形象塑造上,也发生在所有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的塑造之上。

三、女劳模形象的多重政治与文化意蕴

新中国大力表彰女劳模的现实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妇女人力资源,调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从而解决劳动力匮乏等现实问题。文学艺术中的劳模形象,除了担负社会动员作用以外,还具有政治、道德、性别、审美等多重政治与文化意蕴。

第一,女劳模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创造的社会主义妇女新形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和人民的崇高性。上文所分析的女劳模文本,除了侯隽以外,从20世纪50年代护厂英雄邵玉梅、纺织模范杨玉兰,到60年代农村公社劳模方秋梅、铁姑娘张秀敏,都来自社会最底层,隶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旧社会,她们都饱受上层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作为劳动人民,她们被赋予了政治正当性和道德优先性,成为被尊重的国家主人翁。这些曾经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社会地位,体会到人生价值,而且获得巨大荣誉,受到国家表彰与奖励。作为旧中国曾遭受磨难、备受歧

①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199页。

②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02页。

③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27页。

视的底层妇女，女劳模们在新中国普遍自然而然地迸发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之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在作品中，作家采用了新旧对比的手法，突出女劳模们对新中国的感激、对共产党的感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女劳模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巨大转变，无疑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作为广大劳动妇女中的优秀代表，女劳模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党和人民的崇高性。作家都把女劳模形塑成“人民的女儿”“党的女儿”，不断地感叹她们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邵玉梅、杨玉兰、侯隽、张秀敏不仅是优秀劳动妇女代表，还是党和人民的具象化载体。邵玉梅被厂党委称作“人民的好女儿，党的优秀党员”，张秀敏被叙述人称作“党的亲女儿”。“当个体被赋予不同身份时，就意味着他接受并内化了与身份相适应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在现实中，通过个体行动者的行为，该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得到了强化，从而也强化了行动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①]当这些妇女入了团、入了党，被评为劳动模范以后，她们就有了自觉的政治身份认同，在思想认识上更加坚定，在实际行动上更加吃苦耐劳，能为集体生产出谋划策，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入了党、受到嘉奖之后的邵玉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为党为人民贡献出所有的力量，把整个生命与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做的斗争”[②]。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观念性、抽象性的新事物，对普通民众来说，它需要具体的、可视可仿的言行来阐释，需要具有示范和整合作用的人物来展现。而女劳模形象的建构与出现，“从而使得以观念形态”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具体的、可视可仿的实体形态，发挥了榜样示范和社会整合的功效”[③]。女劳模与党、人民、社会主义之间“构成一个彼此指涉，相互证明的社会主义‘崇高形象’的链条”[④]。

第二，女劳模形象推动了妇女解放进程，帮助劳动妇女改变了传统性别认知、建立现代性别理念。劳动妇女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不仅来自阶级压迫，还来自性别压迫。性别压迫最醒目的表现就是建立在“男主内，女主外”性别分工基础之上的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女劳模们成功地闯入各行各业，打破了传统的行业性别隔离，让妇女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工作权利，获得了经济独立和开阔的生命空间。女劳模们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顽强意志克服了文化低、体力弱的困境，做出不逊色于男性的社会贡献，大胆实验创新，甚至创造了奇迹。女劳模形象打破这一传统性别观念，改变了社会性别认知。

《姐妹俩》中的纺织模范杨玉兰，不仅学习女劳模郝建秀的工作方法，而且在此基础上寻求改进方法，力图消除纺织中经常出现的白点问题，提高了产量；《小丫扛大旗》中张秀敏带领铁姑娘，在一年之内竟然将一个在解放前年年靠着全村人外出乞讨才能活命的“花子营”建设成了富裕村。妇女在公共领域劳动中发现了自己被压抑的人生智慧与力量，自立自强，赢得了社会尊重，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妇女的丰富多彩的人生。这一切不仅冲击了整个社会对妇女所持的陈腐观念，而且也改变妇女自身的性别理念，帮助妇女建立性别身份自主性，让妇女不再因生而为女性就自我否定、自我厌弃、自我封闭。国家对女劳模的表彰与宣传，加大了女劳模的影响力，为妇女树立效仿的样本，让妇女们重新审视女性这一性别、规划自己的人生，清除传统性别理念的影响，挣脱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束缚，追随女劳模们开创新生活、创造新人生。新闻媒体、文学艺术等媒介中活跃在各

①胡全柱，陆小聪：《集体主义工作伦理的社会建构——一位女劳模的口述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白朗：《为了幸福的明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81页。

③胡全柱，陆小聪：《集体主义工作伦理的社会建构——一位女劳模的口述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④曹霞：《“妇女”想象与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视角及其功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个生产领域的女劳模形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妇女创造新生活、新形象的重要参照物,女劳模形象引领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建功立业。《姐妹俩》里的女劳模是在学习郝建秀的工作方法中成长,《特别姑娘》里的侯隽就是效仿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才下决心到农村落户。《小丫扛大旗》里张秀敏带领的铁姑娘队与司家庄的燕子队,是"两面全国知名的大红旗""是比、学、赶、帮的对手"[①]。

具有引导、示范作用的女劳模形象,吸引了大批妇女,尤其是底层劳动妇女,突破传统性别规范,走进了长期被男性独占的公共空间,推动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帮助妇女建立了自尊自信、自强独立的现代妇女观。

第三,女劳模形象建立了新中国妇女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价值的高度重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价值结构金字塔里,体力劳动者被看作是下贱者,处于社会底端。在封建主义思想浸润下,"劳动下贱"的思想和"穷是命里注定"的宿命论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而在最底端的劳动妇女也有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理念,轻视劳动、依附男性,把安逸清闲、养尊处优作为幸福生活的目标。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把劳动与人的本质和幸福联系起来,赋予劳动的神圣性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写出了《庶民的胜利》,指出此次战争是"劳工主义的战胜""庶民的胜利"[②];陈独秀预言将来的社会是"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③]。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劳动获得了政治和伦理的正义性。"所谓劳动幸福就是劳动主体对自我劳动状态的满意和满足,在劳动过程中感觉到愉悦和美好,在劳动中深刻体认到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彰显,体认到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④]。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不再是压抑的、被迫的,更重要的是国家赋予劳动者极大的荣誉,劳动者获得了崇高的尊严,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社会身份,劳动与幸福生活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

文学艺术中的女劳模形象,把社会主义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推广、散播到了更加广泛的人群之中。护厂英雄邵玉梅瞒着哥哥去兵工厂做女工,纺织模范杨玉兰星期天自愿到厂里学习,铁姑娘侯隽、张秀敏主动请缨参加农村建设,她们不怕苦、不怕累,在劳动中得到领导、同事的引导、帮助,一步步克服困难,很快地成长起来,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肯定,体会到作为人的力量和价值,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尊严感,获得了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存在感、尊严感、幸福感、满足感,反过来促使她们建立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排斥不劳而获、贪图享受的价值观。

第四,女劳模形象建立了新中国妇女以劳动为美的女性审美观。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在妇女身上建构起了以柔弱娇小、婀娜婉转等为特征的女性审美观,新文化运动打破这一带有病态美的女性审美观,尤其是左翼文学中所塑造的革命女性、时代女性以及解放区文学中的女英雄,都具有勇敢坚定、开朗大方、健康热情等女性新气质,但是,真正能够将以劳动为美的审美观传播到广大妇女群体之中,被妇女们广泛地接受,还是新中国文学艺术所塑造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新妇女形象。其中,女劳模形象起到了更大的引领、示范作用。不过,由于一些文学书写与报道宣传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人们在头脑中对女劳模形成了"皮肤黝黑、身材强壮、性格泼辣""与男子无异"等单一化的刻板印象。本文所论述的女作家塑造的女劳模,却与这种无性别、雄性化的刻板印象不尽相同。

《为了幸福的明天》一再强调,即使受了重伤留下伤疤也不能完全遮挡邵玉梅的美丽,而且因

①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05-206页。

②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③陈独秀著,王观泉选编:《〈独秀文存〉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④陈学明,毛勒堂:《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为从小忍饥挨饿，邵玉梅的身体并不强壮。《特别姑娘》里的铁姑娘侯隽“看上去性格温顺和稳重”。与同时期男作家笔下的铁姑娘相比，女作家所呈现的女劳模，她们的劳动美不是来自强壮的身体，而是来自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劳动美的政治化氛围越来越浓烈，女劳模形象的衣着打扮、性情也日趋中性化。《特别姑娘》里的侯隽“她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顶旧草帽，身个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的上衣，下边裤子膝盖上补着补钉，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①。当铁姑娘张秀敏要去参加省农业先进会议之时，她“穿上一身表里三新的青棉裤棉袄，扎裹得像个小新郎官”②。其实，现实生活中女劳模对朴素之美的追求，其中也包括便于劳动生产的现实功用。比起生活中的女劳模，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中的女劳模形象，她们的衣着打扮、精神气质、性格品行更具有示范性和传播性，她们成为这一时期被广大妇女竞相追逐的时尚人物，引导着时代的潮流。长期以来，时尚女性都是处于被凝视、被消费的状态，而这一时期以女劳模为中心的女性时尚人物，却成功地将人们对妇女的关注重心引导在妇女的能力与意志上。

四、小结

与普通妇女形象不同，被国家表彰的女劳模是一个兼具性别、阶级、政治等多重意蕴的文化政治符号，多重政治文化资本都参与了这一符号的建构，因而，“十七年”时期文学艺术中的女劳模形象，为人们提供了值得借鉴与需要反思的样本。新中国对劳动妇女社会价值的重视，对劳动妇女社会地位的肯定，对劳动妇女中优秀分子大规模、高层次的表彰，这一切由国家政策与措施所构成的意识形态，让原来被隔绝与分散在家庭之中遭受歧视的妇女变成了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群体，使劳动妇女与工人、农民阶级一道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进入了长期以来被男性霸权的社会公共领域；而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的劳动妇女又在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施展妇女的才华与智慧，发挥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的新业绩和新成就，成为了受到国家鼓励与奖励的劳动模范，进而改变了传统的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妇女审美。国家意识形态与女劳模形象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动的状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庇护与帮助下，劳动妇女创造了崭新的人生形象——女劳模；而具有党和人民所要求的优秀品质和道德情操的女劳模，又证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当性，证明了党和人民的崇高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兵工厂护厂英雄邵玉梅、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到农村人民公社劳动模范方秋梅，再到铁姑娘侯隽与张秀敏，这一时期女作家所构建的女劳模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种互动过程、同构关系。在泛政治化的时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符号象征，女劳模形象建构又不可避免地产生泛政治化的效果。女劳模形象是国家政治符号之一种，她们要承载国家意识形态对优秀妇女的期待和要求，因而，随着社会政治化日趋浓重，女劳模形象塑造的政治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在有关劳动模范的通讯报道中更加严重、更加普遍，女劳模形象越来越单一化、雷同化、概念化、无性别化。相对于其他妇女形象，女劳模形象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妇女形象，但是，从艺术层面来看，女劳模形象则是存在问题最多的新妇女形象。尽管新中国女劳模形象建构存在着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新中国文学艺术中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遗产；新中国对底层劳动妇女的大力表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所采取的倾斜性政策，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责任编辑：李　炜]

①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191页。

②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18页。